

1925 年戴季陶思想中的政黨角色

施純純*

本文主要討論 1925 年戴季陶兩篇著名文章：〈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所描述的政黨角色。在這兩篇文章中，戴季陶指出三民主義與蘇聯革命經驗的相似性，即生產力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以此肯定聯合蘇聯的政策方向，以及政黨主導生產力發展的角色。基於蘇聯革命經驗，戴季陶質疑中國共產黨之階級鬥爭策略違反了中國生產力和階級分化的客觀條件。

另一方面，在政黨與社會群體的關係上，戴季陶認為革命政黨應具有獨立於社會的政治自主性，具有灌輸政治意識於社會群體的功能。國民黨應灌輸正確革命意識於社會菁英，使他們領導工農群眾；若社會菁英未能被轉變意識，國民黨員應取代社會菁英的領導角色，而無須變革中國社會結構。而中共灌輸唯物史觀而使工農群眾產生「革命性」而激化群眾，這意味著群眾的激進並非源自社會內部矛盾的苦難程度，而是中共有意引發。針對戴季陶對中共的批評，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陳獨秀認為階級鬥爭是動員工農群眾進行國民革命的必要手段；此外，陳獨秀認為政黨反映、代表了社會階級，進一步指責戴季陶統一國民黨思想的作法，實則試圖排除國民黨內的其他階級，將國民黨轉變為資產階級的政黨。戴、陳二人因而呈現對政黨角色的不同看法，戴季陶認為國、共兩黨主導了不同的革命方式，但陳獨秀認為國、共兩黨代表了不同的階級。但無論是戴季陶或陳獨秀，兩人所理解的政黨角色都引導出國、共兩黨必將衝突的結論。雖然在共產國際的主導下，國、共合作仍持續進行，但戴季陶與陳獨秀在理論上的爭論，已經呈現國、共兩黨革命道路的分歧，以及兩黨鬥爭的必然性。

關鍵詞：戴季陶、政黨、三民主義、階級鬥爭、陳獨秀

一、前言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共合作從此失去一個平衡大局的領導人。1925年夏，戴季陶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篇長文，對於國民黨與共產黨均產生了影響。國民黨方面，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和西山會議將戴季陶的長文奉為理論，於1925-1926年間在中國內外湧起反共浪潮¹。中共方面將戴季陶的文本冠上「戴季陶主義」，掀起一波對「國民黨新右派」的批判²；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甚至依據戴季陶的長文而提出中共應退出國民黨的提議³。國、共分裂之後，戴季陶對於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解釋，成為蔣中正所認可的官方解釋權威⁴。

¹ 李雲漢，〈孫文主義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1925-1926）〉，收入高純淑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第四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296-302。

² 徐素華、賈紅蓮、黃玉順等指出，「戴季陶主義的出現，是當時民主革命統一戰線內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領導權鬥爭的集中反映，是國民黨內部右派分子反共反革命活動加強的信號」。王奇生認為，「國民黨內，自孫中山去世後，只有戴季陶一人公開著書立說，試圖與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對壘。但戴書剛出籠，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圍剿。戴幾乎沒有回擊便偃旗息鼓。中共贈以『戴季陶主義』的頭銜，實在有些抬舉了他」。雖然王奇生認為戴季陶當時的長文被高估了重要性，但戴季陶的理論受到國民黨內反共團體的重視，被援引為理論依據，又於當時引發中共贈以「戴季陶主義」並大肆批判的情況來看，戴季陶的理論實有其重要性。鄧中夏即指出，「戴季陶主義在當時的影響確不小，促成國民黨內部的分化，而新右派遂以形成」。徐素華、賈紅蓮、黃玉順等，〈三大思潮鼎立格局的形成——五四後期的思想文化論戰〉（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7），289；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修訂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72；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9。

³ 陳獨秀指出：「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所牽制。」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7-88。

⁴ 蔣中正在其〈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中，曾指出三民主義的原理或哲學基礎是「民生哲學」，並提到戴季陶有一本專著對此闡明得很詳細。蔣中正，〈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收入蔣總統言論彙編編輯委員會，〈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二專著（臺北：正中書局，1956），148。許多研究者亦強調戴季陶與蔣中正思想上的連續性，參見賀淵，〈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135-150；Herman

由此可見，戴季陶兩篇長文所提出的三民主義詮釋，提供了區隔國、共雙方政治思想界線的思想資源，成為孫文主義學會、西山會議、以及1927年之後的蔣中正等國民黨反共陣線的理論依據。

過去許多研究者，或側重於1925年戴季陶思想呈現的反共態度，或判定戴季陶文章中的階級立場；而戴季陶強調中國傳統價值、文化的特點，尤為研究者所注意⁵。有別於上述研究，本文試圖解析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兩篇長文中的政黨角色，亦即戴季陶對於政黨功能、作用的說明，以及政黨與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⁶，呈現戴季陶詮釋三民主義、反思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的特殊之處⁷。

Mast III and William G.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1 (November 1974): 98.

⁵ Mast III 和 Saywell 將戴季陶強調中國傳統優越性的思想稱之為「文化主義」(culturalism)。李雲漢則強調戴季陶反共的政治態度，認為戴季陶是「國民黨人中有系統的建立反共理論的第一人」，並視戴季陶這兩篇長文為「劃清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上的界限，使國民黨員得以建立以中山先生思想為中心的共同信仰」。滕峰麗延續中共 1925 年對於戴季陶的批評，認為戴季陶的文本反映了資產階級的立場，因而反對階級鬥爭，並進一步將戴季陶重視傳統的思想特質視為「三民主義儒家化」的開始。Herman Mast III and William G.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87-91；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市：李雲漢，1987），398-412；滕峰麗，《民國時期的三民主義—戴季陶思想研究（1909-1928）》（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109-127。

⁶ 李朝津認為，相較於戴季陶 1911 年尋求個人解放、政治解放的民族國家觀，1925 年戴季陶試圖基於經濟和個人發展，建立一個兼顧人類生活基本需要和超越階級界線的社會；「國家」(state) 作為一個超越社會的主導力量，透過規範社會中之不同利益以及鎮壓「反革命」(anti-revolutionary force)，塑造一個「全國性社會」(national society)，並抵禦外國侵略。然而，在 1925 年戴季陶的思想中，「國家力量」如何規範社會的不同利益、如何超越階級界線而統一社會等問題，以及更重要的，戴季陶如何理解幫助形成、塑造「國家力量」的關鍵角色—「政黨」，在中國實際情況發揮的作用，李朝津並未多著墨。Lee Chiu-chun, "From Liberal to Nationalist: Tai Chi-t'ao'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Order"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3), 238-254.

⁷ 關於〈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文，本文引用 1925 年 7 月底至 8 月初刊登於《民國日報》的版本，主要收集自中央研究院之《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1911-1949）》。〈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文，本文引用原收藏於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現藏於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孫中山紀念圖書館之 1925 年的版本。需說明的是，〈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以連載的方式刊登於《民國日報·覺悟》，除了第一篇、第二篇（一續）、第七篇（六續）以〈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為名，其他連載文章（二續、三續、四續、五續）名稱則改為〈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

孫中山逝世、國共之間的紛爭，是戴季陶寫作這兩篇文章的重要背景。戴季陶曾於五四時期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並且曾經支持初期中共建黨的運動⁸；然而，戴季陶最終並未成為中共成員，也反對孫中山在國民黨內容納中國共產黨⁹。孫中山逝世之後，國、共之間的衝突浮上檯面，國民黨內爭取領導權的鬥爭也隨之進行。1925年5月，戴季陶在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上發言，提出以孫中山思想全部以樹立國民黨「思想中心」的提案；戴季陶於1925年12月給蔣中正的一封信中說明此一提案的意圖所在—「確知今後欲救吾黨，惟有決定一根本方針，合全黨同志之力以赴之，惟此乃可謀黨政之鞏固。此方針為何，則以總理之思想與主張之全部，為本黨不易之信仰是也。¹⁰」由此可知，戴季陶期望透過他的文章以提供三民主義的「正統解釋」，掌握孫中山三民主義的解釋權，建立一個以其三民主義解釋為中心的真正統一國民黨。

而戴季陶寫作這兩篇長文的另一背景，是五卅事件和抗議帝國主義之群眾運動的爆發。此時，戴季陶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中發現「在學生及勞動界，全部為 C. P. 勢力」，「黨務則除 C. P.、C. Y. 之外，無人負責努力。¹¹」戴季陶尤其憂心中共的言論和對國民黨的批評是為了「取得完全指導

⁸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戴季陶首先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籌備工作，甚至將自己的寓所提供出來以作為活動場所。范小芳、包東波、李娟麗，《蔣中正的國策顧問戴季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87-88。

⁹ 1923年，戴季陶回上海參加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時得知孫中山的容共政策。戴季陶反對這一政策，並對廖仲愷提出了三點意見—絕不能借款作黨費，即使借款也不能受牽制；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不能存在兩黨籍；戴季陶個人絕不任職中央執行委員，也不出席代表大會。然而，即使戴季陶反對容共政策，戴季陶仍奉孫中山之命赴粵出席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旋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又推定為常務委員、宣傳部長。上述說明參見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的生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197-198。

¹⁰ 關於上述一屆三中全會的說明，參見謝幼田，《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上冊（香港：集成圖書有限公司，2001），182-184；戴季陶，〈致蔣中正先生書〉，收入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9），983-984。

¹¹ 〈戴季陶致胡漢民（1925年7月14日）〉，收入陳紅民輯注，〈戴季陶1925-1926年間致胡漢民等幾封信〉，《民國檔案》4（2005.11），4。

青年的地位」，戴季陶以此判斷「國民黨與 C. P. 實已入抗爭期，而不能再緩。若再聽其若是荒唐，一年之後，完全無可救藥。¹²」因此，這兩篇文章的出版，更有著爭取革命青年重新信仰三民主義，幫助國民黨抵禦中共革命論述之影響力的用心。

無論是重新確立國民黨內的「思想中心」或與中共爭奪革命青年，戴季陶均必須說明政黨如何進行革命、應該進行何種革命等問題，以作為統一國民黨、說服革命青年的論述依據。以下即從戴季陶詮釋蘇聯經驗開始，說明戴季陶如何連結蘇聯經驗與三民主義的相似性、界定政黨在革命過程中的功能與角色，以及國民黨如何處理政黨與社會群體的關係等重要問題。並透過上述問題，呈現戴季陶闡述國民黨之革命方式的特殊性，以及戴季陶指責中共的策略違反蘇聯經驗和中國客觀條件的錯誤之處和危險性。最後，將戴季陶與陳獨秀對照，對比戴、陳二人如何認知政黨角色的差異，以及雙方如何透過政黨角色的理解、解釋而預見國、共未來的衝突。

二、生產力的必要性：反思蘇聯的經驗

戴季陶文章備受爭議之處，在於將民生主義視為孫中山最重要的論點，為三民主義的「本體」，並提出「中國固有之倫理哲學的和政治哲學的思想」為民生主義的哲學基礎¹³。戴季陶聚焦於「民生」，並引用孫中山界定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大同主義的關聯性以說明民生主義的性質¹⁴；戴季陶主要的目的在於區隔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除

¹² 〈戴季陶致胡漢民（1925年7月）〉，收入陳紅民輯注，〈戴季陶1925-1926年間致胡漢民等幾封信〉，《民國檔案》4（2005.11），5。

¹³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8日，第3頁；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9日，第2頁。

¹⁴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

了哲學基礎上的差別，共產主義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為理論基礎，民生主義以中國固有之倫理哲學和政治哲學為基礎。在實行方法上，戴季陶指出共產主義以無產階級之革命行動為實行方法，主張階級專政、打破階級；而民生主義以國民革命的形式，以國家權力實行，主張「革命專政」，「漸進的消滅階級」¹⁵。

何謂「革命專政」？以國家力量所執行的「國民革命」又是什麼？戴季陶將蘇聯革命解釋為「證明三民主義的成功」¹⁶，以回答上述問題。就戴季陶的看法，蘇聯革命經驗證明了生產力的必要性，以及由一強有力的政權來主導生產力發展的規劃。首先，蘇聯轉向新經濟政策，證明蘇聯在生產力不足的情況下實行共產主義的失敗¹⁷。蘇聯必須回到發展生產力的道路，因而才有與德國簽訂條約、實施新經濟政策、吸收外國資本等措施；而這些措施未引發如同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後果，戴季陶認為關鍵在於是要「有堅決革命精神的列寧政府」才能行之無害¹⁸。因此，在戴季陶來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不只有同樣的目標和世界性質，還有同樣必需建立在工業生產力上的物質前提；其中，以「具堅決革命精神」之革命政黨所領導的政府，即是建立此一工業物質前提的主導角色。

相較蘇聯，中國更加沒有足夠的生產力和大規模的階級分化，因而缺乏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¹⁹。戴季陶認為中國當前的要務首

7月28日，第3頁。

¹⁵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9日，第2頁。

¹⁶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9日，第2頁。

¹⁷ 戴季陶指出：「俄國的人，要到了條件不具備的理論行不通的時候，才會懂得回到基本工作的新經濟政策」。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9日，第3頁。

¹⁸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9日，第4頁。

¹⁹ 戴季陶指出：「中國的社會，就全國來說，既不是很清楚的兩極對立，就不能完全取兩階級對立的革命方式」。參見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三續）〉，《民國日

在生產，而及於分配問題²⁰。發展中國生產力的方式，戴季陶以孫中山的《實業計畫》為例，指出「在原則上實業的設計、組織管理之權，完全屬諸於國家」；相對於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實業的設計、組織管理等權力，則掌握在少數資本家手上²¹。如此，透過引用、詮釋孫中山思想，戴季陶指出中國經濟規劃的權力不僅必須掌握在「中國國家」手上，且「何人替國家代握此權行此事」，則「惟有真正以三民主義為信條的革命黨」，才能確保中國不致淪為被帝國主義列強利用的處境²²。

戴季陶以三民主義重新詮釋蘇聯革命經驗、力求三民主義與蘇聯革命經驗的共同之處，在此之前，孫中山也運用同樣的詮釋策略。在 1924 年〈三民主義〉的演講中，孫中山已指出俄國經濟程度「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²³；並且在 1923-1924 年透過強調三民主義和俄國革命的相似性，一方面說服國民黨內反對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員，一方面與中國共產黨爭奪與蘇聯合作的機會²⁴。在 1925 年，戴季陶面臨更為棘手的情況—即一方面要維持與蘇聯的合作，同時回應中共試圖主導革命解釋權和革命策略的影響力。透過戴季陶的解釋，基於生產力的必要性、生產力作為共產主義革命的前提、以及由革命政黨主導和規劃生產力發展的角色，蘇聯經濟政

報·覺悟》（上海），1925 年 7 月 30 日，第 3 頁。

²⁰ 戴季陶指出：「求改造中國的經濟組織，第一要緊的，是要增加中國的生產能力，同時防止由生產能力發達而生的社會病」。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 年 7 月 29 日，第 3 頁。

²¹ 戴季陶主張：「在私有財產的原則上面，少數有產階級的人，一方面負組織設計管理之全責，一方面操分配的全權，而結果便享受最大限的報酬」。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 年 7 月 29 日，第 2 頁。

²²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 年 7 月 29 日，第 4 頁。

²³ 孫中山，〈三民主義〉，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155。

²⁴ 李雲漢指出，從 1923-1924 年，孫中山不只一次說明俄國革命與三民主義之共同之處，包括俄國革命用力最多為民族主義，以及俄國新經濟政策是國家資本主義，實與三民主義相同等觀點。詳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195-196。

策的轉向「並不能證明共產主義的成功，實足以證明三民主義的成功」²⁵。基於革命路線的相似性，國民黨才是真正與蘇聯革命同道的革命者。

而生產力未成熟之前不能任意變更生產關係的蘇聯經驗，進一步構成了中國革命的方向、框架與限制。戴季陶指出：

我們中國是一個偉大的農業國家。中國的需要，在產業上要盡量的發展生產能力，在國民經濟的建設上，要認清楚農業的革命，農民經濟的實力養成，和組織能力增進，為目前最切的要圖。……在文化低微，經濟落後至於如此的國家，最近的將來時期中，想要以工業的無產階級專政來達到革命建設的目的，那裡可以做得到？²⁶

如上引文所述，戴季陶並不認為中國工業無產階級有能力掌握政權，以「工業無產階級專政」來建設中國。既然革命政權的基礎並不應該是工業無產階級，這意味著工業無產階級爭奪政權的「階級鬥爭」也不應該進行。

戴季陶因而批評中共黨員不顧及中國客觀條件而欲進行激進變革的策略，認為「如果中國經濟的條件和文化的條件具備，有實現他們（中共）的計劃的可能性，我們不但是不反對，並且也會自己主張起來」，然而，戴季陶認為目前中國「條件毫不具備」，「通過國民的需要程度和社會的經濟條件，結果就是使中國受長時間的擾亂，使中國衰微的民族更因擾亂的災禍而減少人口、阻礙文化。」²⁷

基於中國目前的客觀條件，戴季陶堅持「現在我們中國需要的是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並批評中共「用單純以階級鬥爭為手段達階級專政目的的政治理論指導現在的青年」，殊不知「共產的條件，既不會因空想而具備，

²⁵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9日，第2頁。

²⁶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25），72-73。

²⁷ 括號為本文所加。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61。

國民革命又因此生許多（障）礙」²⁸。如此，戴季陶以「客觀生產力不足」的論據，反駁中共進行的階級鬥爭策略，並將中共所進行的階級鬥爭視為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指責中共的策略既違反三民主義也違反蘇聯經驗²⁹。戴季陶的論證既維護了國民黨聯合蘇聯的政策，並與中共爭奪國、共合作的主導權和解釋權。更重要的是，在戴季陶詮釋下的三民主義和蘇聯經驗，「具備堅決革命精神」的革命政黨主導著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基於此，革命政黨不僅不能挑動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還必須維護支持生產力發展的社會秩序。然而，1920年代中國社會內部的種種苦難和矛盾，同樣是革命政黨所無法迴避的問題，迫使戴季陶提出階級鬥爭之外的解決辦法。

三、政黨自主性與階級鬥爭

基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現況一尚未有清楚的階級對立，並不具備共產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戴季陶因而認為「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所以我們是要促進國民全體的覺悟，不是促起一個階級的覺悟。³⁰」然而，革命過程中個人思想改造和道德實踐，雖然及於國民全體，但並非全體國民的覺悟都具有同等的意涵。戴季陶延續著孫中山對「先知先覺者」的重視，指出「革命的利益，全

²⁸ 括號為本文所加，原文僅有一個「礙」，疑為漏字。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55-56、73。

²⁹ Mast III 和 Saywell 認為戴季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質疑聚焦於孫中山「反對唯物主義」的主張——強調是經濟合作而非階級鬥爭為歷史進化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Mast III 等認為戴季陶也援用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解釋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原因，尤其在帝國主義侵略下中國實際上成為了單一的階級；戴季陶並拒斥中國內部矛盾已構成巨大階級對立的看法，認為中國社會的整體貧窮，使得中共推翻資本主義的主張是錯誤的指導。Herman Mast III and William G.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91-93.

³⁰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三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30日，第3頁。

是為不知不覺的人的利益」；「仁愛」的應用「就是處處要以受痛苦的農夫工人和沒有工作的失業者為目的，要能夠愛他們才是仁愛，不能夠愛最大多數受痛苦的平民，就是不仁，不仁就是反革命。³¹」

由戴季陶的描述來看，雖然中國缺乏工業，因而缺乏資本主義社會之大規模、明確的階級分化，但就中國充滿著受痛苦的農夫、工人、失業者，意味著中國內部仍存在著強大的社會矛盾。戴季陶並未以生產工具的有無來界定階級，而是以模糊的「支配階級」一詞來指涉中國佔優勢的菁英階層：

先生（孫中山）認為階級的差別，並不是絕對能夠消滅人類的仁愛性的，那些不來革命的人，只是不知，如果是能知，他的（仁）愛性依然是能夠發現，依然能夠為受痛苦的農夫工人努力，所以先生（孫中山）在這一點，是主張各階級的人，要拋棄了他的階級性，恢復它的國民性，拋棄了他的獸性，恢復他的人性；換一句話說，就是要支配階級的人，拋棄他自己的特殊地位，回到平民的地位來。所以先生雖是主張各階級的聯合，但這個聯合，是為最受痛苦的人民而起，並且要聯合各階級的革命份子，不是拉攏反革命的份子。³²

上述引文指出了戴季陶解決中國社會矛盾的方式。基本上，戴季陶並非鼓動「受痛苦」的農夫、工人進行階級鬥爭以奪取生產工具或剝奪「支配階

³¹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三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30日，第3、4頁；孫中山，〈三民主義〉，87。

³² 括號為本文所加。1924年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演講中，提及「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並在同一個演講中，指出歐洲工黨之所以有很大的影響力，是由於在工人之外「有知識級高的好義之士做領袖」來引導工人，所以工人的罷工在社會上發生很大的力量；但數十年來，工人團體逐漸發生了排斥領袖的「平等的流弊」，結果在工人沒有智識去引導自己的情況下，內部逐漸腐敗，也失去了大團體的力量。換言之，雖然孫中山並未以「支配階級」來強調工人領袖的階級背景，但指出了工人團體需要依靠非工人的菁英來指導，且這些領袖原本的貴族和學者身分，亦說明了「人的意識獨立於經濟基礎」的可能性。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四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31日，第2頁；孫中山，〈三民主義〉，85-87。

級」的權力，而是要求「支配階級」轉變其自身的思想和態度，為農夫、工人退讓自己的利益。「支配階級」的退讓之所以可能，戴季陶主要建立在人的意識、道德超越階級基礎的假定；在這一假定下，階級聯合和社會矛盾的解決都是可能的，農民、工人的苦難未必「必然地」轉化、升高為階級鬥爭³³。

然而，雖然著眼於社會、經濟領域中的「支配階級」，戴季陶亦意識到轉變這些支配階級意識、道德的困難程度。戴季陶呼籲國民黨員：

要明白了解中國士大夫階級，已經腐敗到了極點，要想救中國，非把最誠實，堅忍，努力，的農工階級的人，喚醒轉來，以他們為改革的中堅，然後中國的民族，才可以有救。³⁴

國民黨員「喚醒」農工階級並使其爭取自己的解放，乍看之下，似乎與中共黨員的政治任務是相同的。然而，基於中國當前的生產力現況，戴季陶認為「農業的革命，農民經濟的實力養成，和組織能力增進，為目前最切的要圖」，而非立即將中國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在文化低微，經濟落後至於如此的國家，最近的將來時期中，想要以工業的無產階級專政來達到革命建設的目的，那裏可以作得到。」³⁵

因此，戴季陶雖要求國民黨員「喚醒」群眾但不進行階級鬥爭、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動員限度；並且以「為農民、工人而奮鬥，絕不須用唯物史觀做最高原則」，限制群眾運動的激進性³⁶。如此一來，儘管國民黨員「喚醒」農工群眾並使其爭取自己的解放，但這一「解放」的範圍、程度，則受到中國當前生產力情況所限制；而農工階級在革命過程中的角色與任務，

³³ 滕峰麗批評戴季陶上述的觀點—「你死我活的階級對立，被輕描淡寫為『利他』還是『利己』的道德問題」。滕峰麗，《民國時期的三民主義——戴季陶思想研究(1909-1928)》，113。

³⁴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36。

³⁵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72-73。

³⁶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49-50。

也受到國民黨員對中國當前情況的判斷所左右。換言之，戴季陶雖然希望能夠改變中國社會內部「支配階級」的道德，使其為農民、工人退讓自己的利益；但若「支配階級」無法改變，國民黨員必須取代中國社會內部之支配階級的社會領導角色，領導工農群眾為發展生產力、建設中國而努力。在戴季陶的思想中，國民黨員僅取代「支配階級」，而非拆解整個社會結構，且革命領導權仍在國民黨手中。

戴季陶所欲農工階級參與的革命是配合發展中國生產力發展的革命，因而不以「唯物史觀」作為動員農工群眾的指導原則；但中共以「說明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唯物史觀」動員群眾³⁷，亦為戴季陶的憂心之處：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究竟價值在那裏，就是在他的革命性。應用唯物史觀，說明社會革命，很容易使勞動階級的人，生出革命的覺悟來。所以唯物史觀是否真理，乃是另一問題。但是在應用的上面，所以能夠取得革命哲學的地位，是因為他思想的自身，具備有豐富的革命性。

38

由上述引文可知，勞動階級透過唯物史觀而「生出革命的覺悟」，意味著勞動階級的階級地位、處境、遭遇等「客觀條件」的悲慘並不必然導致「革命性」的自動產生；勞動階級的「革命覺悟」主要來自「應用唯物史觀、說明社會革命」的中國共產黨。相對於中共，戴季陶「為農民、工人而奮鬥，絕不須用唯物史觀做最高原則」³⁹，則蘊含著菁英領導農工階級的革命領導權意涵，以及避免激進化群眾的策略立場。

從戴季陶的觀點來看，國民黨聚焦於改變「支配階級」的意識、道德而

³⁷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六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8月3日，第2頁。

³⁸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六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8月3日，第2頁。

³⁹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49-50。

使其為農工群眾奮鬥，而中共試圖透過灌輸農工群眾「唯物史觀」而引領他們走向階級鬥爭。國、共兩黨優先著力的社會群體並不相同。另一方面，從戴季陶對於國共兩黨的策略描述來看，無論國民黨以「仁愛」說服「支配階級」，或是中共以「唯物史觀」動員工農群眾，都意味著政黨有能力灌輸社會群體政治意識，且政黨灌輸的政治意識是主導、左右社會群體政治傾向與政治行動的主要力量。在政黨和社會群體之間，戴季陶顯然認為政黨掌握了凌駕社會之上的自主性，並主導了社會群體參與政治的方式與過程。

然而，基於政黨主導社會群體的自主性，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觀點差異成為戴季陶面對的棘手問題。戴季陶必須說明為何中共以「唯物史觀」灌輸工農群眾是「錯誤」的策略，而戴季陶的理論依據即是中國工業的落後和蘇聯革命經驗的啟示。在中國生產力不足和缺乏大規模階級分化的情況下，中共以唯物史觀灌輸群眾而試圖引發群眾的「革命覺悟」，若成功地促使群眾進行階級鬥爭甚至進一步達成無產階級專政，均是違反蘇聯經驗和中國生產力現況的「錯誤」策略。在戴季陶看來，國民黨員「為農工群眾奮鬥」、「喚醒」群眾但避免群眾激進化、並優先發展生產力的策略，才是適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革命道路⁴⁰。而基於革命政黨主導社會群眾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國民黨欲實踐優先發展生產力的革命道路，所遭遇的首要障礙並非社會內部的矛盾和苦難，而是將這些客觀矛盾、苦難轉化為階級鬥爭的中國共產黨。若國民黨企圖阻止中共激化群眾的策略，兩黨因而產生的政治

⁴⁰ Arif Dirlik 描述 1927 年之後國民黨內派系與共產黨關於政黨角色、群眾運動的不同看法。其中，國民黨「左派」（以汪精衛為首）認為，國民黨既非如同「右派」宣稱那樣，凌駕於所有階級之上，也非如同共產黨做為單一階級的政黨，國民黨應代表所有被壓迫的階級，為被壓迫的階級所組成的聯盟。就本文討論的戴季陶對於政黨角色的看法，他一方面如同國民黨「左派」的指責，認為政黨具有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自主性；但這一政治自主性運作的基本方向，戴季陶則認為應該為被壓迫階級的生存、利益而服務。只是，透過何種方式才能「真正」為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服務，戴季陶著眼於生產力的發展、政治統一，以及國民黨的領導。Arif Dirlik, "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mintang," *Modern China* 1:1(January 1975): 54.

衝突，則可能更進一步地加劇了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動盪。

四、五卅事件的策略

戴季陶關於政黨角色的看法，不僅與中共在理論上產生論爭；在五卅抗議運動的背景下，戴季陶與中共的理論差異亦延伸為實際群眾運動的策略分歧。1925年5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並槍殺抗議中國工人顧正紅被日廠殺害之事件的學生及群眾，是為五卅事件。五卅事件及後續引發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抗議活動，為1920年代最重要的群眾運動，民族議題與階級議題均被提上政治議程。雖然五卅事件並非蘇聯所設計引發，但抗議運動爆發時，史達林一方面指示推進群眾運動，另一方面下令煽起反對張作霖的活動，並設法使「中國政府」對運動保持中立；此外，因怕列強知道蘇聯插手中國事務，所以命令蘇聯政府和俄共（布）黨領導人在講話中「切勿宣揚共產國際、蘇聯和俄共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所起的作用」⁴¹。

中共基本上將五卅事件定調為「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民族運動的主力軍—工人階級—進攻，而成於英國帝國主義對援助工人的民族運動之鐵血鎮壓政策」，因而「不平等條約一日不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一日不推翻，中國民族的生命與自由便一日沒有擔保。⁴²」陳獨秀更進一步指出「一切帝國主義者對於我們的剝削踐踏是一致的」，認為「民族自由運動是一個全國運動，全國的學生、工人、商人，都應該同時起來向一

⁴¹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68次會議紀錄節錄（1925年6月25日，莫斯科）〉，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一卷（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524；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7。

⁴² 〈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嚮導》117（1925.6），1076。

切帝國主義者進攻。⁴³」然而，五卅事件後不久，虞洽卿以淞滬商埠會辦的身分從北京回到上海，依據段祺瑞政府不擴大事件範圍為原則，將日紗廠事件定調為勞資衝突，而將公共巡捕房對學生開槍定調為政治事件，主張「單獨對英」，分化英商與英國領事和工部局，以及分化日、美、法等國與英國的聯合，並提出較有限的交涉目標⁴⁴。

關於五卅事件的策略，戴季陶認為「我們中國所要求的民族平等國家獨立，是要對一切帝國主義的存在，加以排斥」⁴⁵，其立場與中共相同；但戴季陶並不贊同中共在抗議運動中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作法。戴季陶認為，「我們反帝國主義的行動，要認定第一個目標就是英國。如果在行動上把一切帝國主義的國家，混成一氣看，這就是事實上放鬆了英國。⁴⁶」此外，在抗議運動過程中，戴季陶再度強調國民覺悟、階級聯合、以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並認為這一策略才有助於解決勞工的生計問題。

戴季陶主張「單獨對英」有其經濟效應，認為對英國的經濟絕交可以使中國「將要陷於絕望的工商業，可以得一個復興的機會」，且「單就工人階級來說，如果中國的工業能夠發展，失業的危險總可減少許多，也是應該歡迎的。⁴⁷」既然工商業的發展是工人生計的解方，戴季陶進一步呼籲各階級在民族平等與國家獨立的目標上聯合起來：

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是要各階級同具國民的覺悟，國家的覺悟，才可以得到的。國家的感情，要先於階級的感情，才是國民革命的基礎。⁴⁸

⁴³ 陳獨秀，〈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嚮導》117（1925.6），1077、1078。

⁴⁴ 整理自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194-198。

⁴⁵ 戴季陶，〈因五卅事件告中國國民〉，《湖州月刊》2.4（1925），6。

⁴⁶ 戴季陶，〈因五卅事件告中國國民〉，6。

⁴⁷ 戴季陶，〈因五卅事件告中國國民〉，8。

⁴⁸ 戴季陶，〈因五卅事件告中國國民〉，8。

透過上述引文，戴季陶不僅向中共與工人喊話，也同時針對著上海的「支配階級」。戴季陶在〈指導五卅事件國民運動的注意點〉（1925年6月27日）一文中，提醒國人「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才是五卅事件的根本解決，並批評上海總商會所提出的談判條件，「不能開明要求工人結社集會權團體契約權」。⁴⁹另一方面，戴季陶亦提醒主張罷市罷工的中共：

這一回的問題，不是上海打殺學生一個單獨的小問題，尤其不單是日本紗廠和工人團體的一個經濟鬥爭，是外人壓伏中國獨立運動和中國人要求國際平等國家獨立的一個大問題。這一個大問題，要中國人民永久不斷的努力才可以成功，並且要聯合了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我同在被壓迫地位的民族，共同奮鬥，才可成功，決不是一個短期間的罷市罷工所能解決，所以這次罷市罷工，只可以成為一種示威，一種事實宣傳，並成為具體的國民運動的起點，而不能做為解決問題的方法。⁵⁰

上述引文顯示，戴季陶強調國際間被壓迫民族聯合抵禦帝國主義壓迫的重要性，並將之視為中國要求國際平等的重要途徑。戴季陶認為孫中山所主張的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以國民的國民會議，建設起國民政府」，才是求中國民族獨立的解決之道⁵¹。

如此，儘管戴季陶與中共均同意「取消不平等條約」和「維護工會組織」，但雙方不僅在五卅群眾運動中有著「單獨對英」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策略差異，且戴季陶認為中國應趁機發展工商業、並引用孫中山而強調中國政治統一的優先性，亦構成罷工罷市等群眾運動的動員限度。戴季陶與中共在策略上的分歧之處，不僅在於是否繼續進行罷工等問題，

⁴⁹ 戴季陶，〈指導五卅事件國民運動的注意點〉，《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6月27日，第3頁。

⁵⁰ 〈戴季陶對於時局之談話〉，《民國日報》（上海），1925年7月31日，第2張。

⁵¹ 〈戴季陶對於時局之談話〉，《民國日報》（上海），1925年7月31日，第2張。

更重要的，是革命政黨應該領導何種革命、應該將何種革命目置於優先等問題。

而戴季陶與中共的分歧，亦影響了實際的運動過程。基於戴季陶文章的影響力，部分學生接受了戴季陶「單獨對英」的主張，進一步導致學生團體的分裂⁵²。就中共的角度來看，罷工運動走向低迷、戴季陶與上海總商會同樣支持「單獨對英」策略、戴季陶言論對運動的實質影響、以及戴季陶對三民主義的詮釋，均意味著戴季陶文章的政治效應不僅影響五卅事件的抗議運動過程，更擴大到國共合作的前景。之後，陳獨秀及其他中共黨員譴責上海總商會等「資產階級」在五卅群眾運動過程中妥協軟弱的表現⁵³；戴季陶企圖統一國民黨理論的兩篇文章，亦同時被視為將國民黨「資產階級化」的嘗試⁵⁴。

但國、共合作仍持續進行。戴季陶期望透過他的兩篇文章統一國民黨，建立「思想中心」，並從理論和策略上消除國民黨與中共之間的分歧。因而，戴季陶要求中國共產黨員須放棄共產黨而全心加入國民黨，「要不然你們就真正組織起一個工黨，或者把你們自己的黨拿出來。」⁵⁵若共產黨員未改變其思想，國民黨勢必得清除黨內的中共黨員⁵⁶。然而，進一步就戴季陶思想來看，即使共產黨脫離國民黨而「拿出自己的黨」，基於政黨主導社會群體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國民黨為維護其生產力優先的革命道路，

⁵²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204。

⁵³ 陳獨秀，〈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嚮導》125（1925.8），1145；秋白，〈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嚮導》125（1925.8），1147-1148。

⁵⁴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87-88。

⁵⁵ 戴季陶因而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中，重申在「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為農民、工人而奮鬥，絕不用唯物史觀作最高原則」，並要求共產黨員（告CP和CY的人們）「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員」。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49-50、52、57。

⁵⁶ 在1925年7月21日邵元沖給胡漢民的信中，指出戴季陶主張「與左派分離，並解除一切左派職員之在黨任務」的看法。〈邵元沖致胡漢民函（1925年7月21日）〉，收入陳紅民輯注，〈戴季陶1925-1926年間致胡漢民等幾封信〉，《民國檔案》4（2005.11），9。

仍必須阻止共產黨以「唯物史觀」激化群眾的策略。因而，無論中共留在國民黨內或脫離國民黨，戴季陶所界定的政黨角色，從理論上指出國民黨勢必壓制、同化、甚至消滅共產黨的策略結果。

五、陳獨秀的回應

戴季陶的小冊子出版後不久，五卅運動中的工人罷工逐漸退潮。當時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陳獨秀，以一封公開信回應戴季陶（《嚮導》周報第129、130期，1925年9月11日、18日），提出不同於戴季陶的革命觀與政黨觀。

陳獨秀首先說明中共「階級鬥爭」的策略目的，主要作為激勵群眾進行革命的動力，並非立即進行生產關係的變革。陳獨秀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因受到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買辦、地主夾擊而陷於無法發展的窘境，自然無法承擔革命目標；中國的革命形勢只能倚靠工農作為革命動力：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之成功，當以工農群眾的力量之發展與集中為正比例；而工農群眾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從事階級的組織與爭鬥，才能夠發展與集中。……因此，我們便應該認識，階級鬥爭即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會革命勞農專政實行共產併為一談。⁵⁷

換言之，陳獨秀並不主張立即進行「勞農專政實行共產」，這回應了戴季陶對中共推動無產階級專政的指責。戴、陳二人均同意中國革命現時應為國民革命階段；但不同的是，陳獨秀認為中國資產階級不能承擔革命目標，中國革命僅能依靠勞農群眾的力量，尤其應透過「階級鬥爭」使工農群眾

⁵⁷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嚮導》129（1925.9），1187。

力量「發展與集中」⁵⁸。在同樣的國民革命目標之下，相對於戴季陶改變「支配階級」的意識以領導革命，陳獨秀則以「階級鬥爭」作為動員手段，將工農群眾視為中國革命進行的主要動力。

而中共透過「階級鬥爭」動員工農，意味著「階級鬥爭」並非自發地產生於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或工農群眾的苦難處境，而是如同戴季陶所說，是中共主動調動工農群眾革命力量而引發。只是，戴季陶認為中共以「唯物史觀」灌輸工農群眾而使其具有「革命性」，但陳獨秀更強調工農群眾在實際的組織與爭鬥中產生意識與力量的過程。對於陳獨秀而言，思想改造的效果頗令人懷疑，這反映在他認為戴季陶所主張的「仁愛」之道德勸說，實際上無法解決任何問題⁵⁹。群眾之所以支持某一政黨，陳獨秀不認為其基於「思想」或「抽象的主義」，而是「為具體的切身利益爭鬥」⁶⁰。換言之，相較於戴季陶所強調的政黨掌握正確革命意識的角色和功能，陳獨秀的政黨是社會群體利益的代表和反映，並預設了不同階級利益之間的分裂與不可調和。

陳獨秀因而反駁戴季陶欲統一國民黨意識形態、建立一「思想中心」的主張，認為國民黨應是「各階級聯合的黨」，因此「於共信（即共同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共同點）之外，便應該有別信（即個別階級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個別點）存在」；而戴季陶試圖消除「別信」而統一國民黨，「主張全黨只許有一個共信」，這意味著「想把全黨中各階級的份子成為某一階級化」⁶¹。陳獨秀進一步說明，由於中國工業發展的滯礙、民族資

⁵⁸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1187。

⁵⁹ 陳獨秀指出：「『仁愛之心』這件東西，如果能解決世界上實際利害上的衝突問題，那麼，便可拿他感動清室讓權於漢人；也可以拿他感動北洋軍閥尊重民權；也可以拿他感動帝國主義解放弱小民族，由他們自動廢棄一切不平等條約。」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1188。

⁶⁰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1188。

⁶¹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1189。

產階級的弱小，卻也使得一個以純粹資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黨很難產生⁶²。如此，考量中國客觀社會情況、階級基礎都未能提供國民黨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物質條件，以及「政黨是社會階級之反映，不是個人理想可以造成的」，陳獨秀認為，目前排除共產黨並不該是國民黨內目前緊要的問題。

63

唐寶林認為，陳獨秀這一段話的政治目的，是必須公開維護共產國際的黨內合作方針；但在實際的思想，陳獨秀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立場上思考那樣，站在無產階級共產黨的立場上，希望共產黨能獨立，退出國民黨，並在共同的革命活動中可以與國民黨進行黨外的聯合行動⁶⁴。在陳獨秀的論述論證中，即使 1925 年的中國社會並無一強大、獨立的資產階級以提供國民黨作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基礎，戴季陶仍企圖藉由排除國民黨內的官僚買辦和無產階級，提出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試圖轉變國民黨的性質⁶⁵。而國民黨階級性質的改變，陳獨秀認為這源自五卅群眾運動中無產階級所表現出的強大力量，「加速了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形成的過程」，直接反映在國民黨和「小資產階級」欲確定他們自己的政治思想並且「要想在組織上鞏固起來」。⁶⁶

在陳獨秀的看法中，戴季陶將國民黨「資產階級化」而提出的理論，與孫文主義學會和西山會議的「反動傾向」，未必能夠等同視之⁶⁷；但經過五卅運動的政治化洗禮，中國社會即使客觀上尚未完全轉變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對立的社會，國、共兩黨卻已經在思想與政治上各自「代表」

⁶²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1190。

⁶³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1189-1190。

⁶⁴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1），325。

⁶⁵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1190。

⁶⁶ 陳獨秀，〈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嚮導》139（1925.12），1266。

⁶⁷ 陳獨秀指出，「鄒魯等在西山開會，表面上雖然是反對共產派，實際上另有破壞國民政府的陰謀，季陶先生未曾出席西山會議，正因為發現了他們這種反革命的陰謀」。陳獨秀，〈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1267。

了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鬥爭的兩個主要階級。從陳獨秀這一觀點來看，戴季陶的理論、西山會議和孫文主義學會，均是對於五卅運動中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的資產階級回應。

根據陳獨秀對於國民黨性質的看法，在國民黨已經轉向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國、共的黨內合作勢必面臨分裂的命運。但身為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仍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維護國、共合作的指示⁶⁸。如此，在共產國際主導的國、共合作脈絡下，陳獨秀與戴季陶對於國共兩黨的衝突有著不同的解析，卻共同得出國、共必將分裂的結論—陳獨秀認為國、共兩黨的衝突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反映，而戴季陶認為兩黨的分裂是兩種不同政治藍圖與引導社會群體方式的衝突。

對此時的蘇聯共產黨和共產國際而言，中國革命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作為「立即進行」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更多是幫助蘇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存在與安危⁶⁹。1925年，透過決定對馮玉祥進行實際援助的決

⁶⁸ 唐寶林指出，陳獨秀提出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建議，基本上不符合莫斯科當局仍欲維持國共合作、要求中共對國民黨「避免加劇關係」的決定。這一策略源自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中共謹慎地做領導國民黨的工作、黨團不應發號施令、共產黨不應要求其黨員非佔有軍政領導職位不可等。陳獨秀於1929年回憶道：「是年（1925）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亦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參見唐寶林，《陳獨秀全傳》，326-327；〈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莫斯科）〉，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一卷，578-579；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87-88。

⁶⁹ 1924年之後，全球資本主義呈現相對穩定的情況，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相繼失敗，共產國際和蘇聯被迫面對如何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下生存的難題。在這一情況下，斯大林提出盡量增加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並拖延戰爭爆發的外交策略，以及「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首要目標聚焦於蘇聯的生存，而非世界革命的爆發。在這一過程中，共產國際的領導也逐漸集中化，反映在1924年7月共產國際五大通過的共產國際章程中擴大執委會的權力。上述關於蘇聯外交政策的要點、以及共產國際領導方式的改變，整理自張玲，〈1926-1935年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政策和影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法政學院博士論文，2002），17-18；劉懷玉、劉維春、陳培永，《資

議和軍援的規模，顯示蘇聯領導人將以政治宣傳為中心的對華政策轉變為以軍事為中心的對華政策⁷⁰。另一方面，1925年5月五卅事件爆發，雖然蘇聯一度指示推進群眾運動，但7月時運動走向低潮，莫斯科即下令採取措施「保證有組織地退出罷工鬥爭，和最大限度地鞏固已取得的成果」⁷¹。在此時，史達林對華政策重點已經轉向軍事方面，在國、共兩黨之間，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經費偏厚國民黨，特別是軍事援助大多給了蔣中正控制的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⁷²。如此一來，即使國、共在各方面時有衝突，五卅事件之後更形劇烈，但現階段的國、共黨內合作，仍符合蘇聯對華政策的重點。

而戴季陶試圖以單一意識形態統一國民黨，是否是陳獨秀所謂的將國民黨「資產階級化」呢？就戴季陶的文章內容來看，其「支配階級」並未被特別界定為資本家或地主，並不能直接指出戴季陶支持資本階級而掃除封建地主；且就戴季陶強調中國必須以革命政黨主導發展工業生產力的情況下，經濟與政治權力也不在資產階級手上。然而，戴季陶試圖以改變支配階級意識的方式進行革命、以國民黨員取代支配階級之領導地位而不是鼓動農工群眾打倒支配階級的作法，意味著戴季陶避免破壞中國社會既有階級關係與社會結構；而在其中，資本家和地主仍佔據優勢地位⁷³。

本主義理解史》第三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309-313；Rober C. Tucker, "The Emergence of Stalin's Foreign Policy," *Slavic Review* 36:4(December 1977): 565-566；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收入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纂，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94。

⁷⁰ 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上冊（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9），148。

⁷¹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4號紀錄（1925年7月28日，莫斯科）〉，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一卷，529；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357。

⁷² 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上）》，158-159。

⁷³ 一些研究者也將戴季陶的言論視為「資產階級」，例如岳艷和馬佩英。其中，岳艷比較陳獨秀和戴季陶，指出「戴季陶與陳獨秀兩人從不同的觀點出發：前者站在國民黨右派立場上要把共產黨員攆出去，後者主觀上為維護黨的獨立性，擺脫國民黨『牽制』」；

然而，「支配階級」意識變革的成效、甚至國民黨掌握政治自主性的程度，在1925年的中國仍有一長段有待實現的距離。戴季陶指出，不只是中國社會中的士大夫階層相當腐敗，甚至國民黨內仍反映了「舊制度之個人主義」的人際模式與政治邏輯⁷⁴。如此，在理論上，戴季陶的革命方案看似提出了國民黨主導的中國革命路線，但國民黨如何建立其自主性以進行支配階級的道德變革，則成為戴季陶革命方案中的關鍵問題。

六、結論

就戴季陶1925年兩篇重要長文所呈現的政黨角色來看，在政黨與社會群體的關係上，政黨不僅具備引導、領導社會群體的政治自主性，且主要透過改變「支配階級」的思想、意識以引導其他社會群體。相對於政黨的政治自主性，社會群體處於被動的角色，其政治意識和政治參與高度依賴政黨的指導和引導，同一社會群體可能會因為不同政黨的影響而擁有不同政治意識與參與政治方式的差異。基於戴季陶主張政黨主導社會群體的自主性和主動性，群眾的激進化因而並非自發、直接地源自於社會內部矛盾的苦難程度，而是中共有意灌輸唯物史觀於工農群眾所引發。

在戴季陶看來，中共的策略之所以錯誤的原因，是基於三民主義與蘇聯革命經驗的相似性，即生產力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基於此，中國共產黨

前者是自覺地爭奪國民黨的領導權，後者是自願退出和放棄領導權的鬥爭。戴、陳二人的出發點儘管不同，但殊途同歸，結果都是使四個階級的聯盟——國民黨，變成清一色的資產階級政黨。」然而，究竟政黨組成份子為資產階級、或政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或政黨維護資產階級優勢的社會結構、或政黨試圖以政治力完成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或反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或提出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才是將國民黨或戴季陶界定為資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言論的標準，則是過往研究並未深入討論之處。岳艷，〈陳獨秀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思茅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8.2（2002.6），98；馬佩英，〈戴季陶的政治思想論〉，《史學月刊》3（2007），60。

⁷⁴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36-38。

之階級鬥爭策略既違反三民主義也違反蘇聯經驗。根據蘇聯轉向新經濟政策的經驗，中國既然缺乏「工業無產階級專政」的客觀工業發達條件，中國亦必須優先發展生產力，而非首先進行階級鬥爭；換言之，中國革命必須在既有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中進行。國民黨因而應透過政黨力量灌輸「正確革命意識」於社會精英、或以國民黨員取代社會精英，在既有的社會結構和階級關係下，使社會菁英、國民黨員帶領工農民眾而建設中國。此既為戴季陶解決中國社會內部矛盾的方式，也是他所賦予國民黨作為一革命政黨的主要角色與功能。

反映在五卅運動的策略上，戴季陶著眼於五卅運動所開啟的、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契機，因而主張限制群眾運動的激進性，認為當前應該聚焦於工業發展和政治統一。然而，戴季陶的思想主張和對於五卅事件的處理策略，卻也引發了與中共的爭論。根據中共領袖陳獨秀給戴季陶的公開信，陳獨秀反駁戴季陶對中共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指責，說明基於中國生產力的現況，中共現階段進行的革命也僅是國民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但國民革命中，「階級鬥爭」作為激發工農革命力量的手段卻是必要的，因為工農革命力量才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動力。陳獨秀並不認為政黨完全自主地獨立於社會，也不相信「思想」獨立的力量，而認為政黨有其階級背景，不同政黨代表著不同的階級利益。因而，戴季陶試圖建立國民黨「思想中心」的做法，在陳獨秀看來，是試圖排除其他階級、將國民黨從多階級政黨轉變為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策略；在五卅事件的背景下，更是民族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的回應。

因此，當戴季陶認為國、共兩黨自主地主導了不同的革命策略與方向時，陳獨秀認為國、共兩黨各自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無論是戴季陶或陳獨秀，他們對於政黨角色的解釋都導引出國、共必將衝突的結論。就戴季陶的思想來看，國、共兩黨終會因為不同的革命路線而產生兩

黨路線上的鬥爭；就陳獨秀的論述來看，國、共兩黨所代表的不同階級已然預示了衝突的必然性。基於政黨掌握「正確意識形態」的角色，戴季陶要求中共完全放棄共產黨而接受國民黨的政綱，否則中共應該退出國民黨；陳獨秀則認為基於國民黨逐漸「資產階級化」，中共應該脫離國民黨，終止國、共的黨內合作。但基於共產國際的中國政策，共產國際仍要求中共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繼續進行國、共黨內合作。然而，在戴季陶與陳獨秀的爭論中所呈現的不同政黨角色和兩黨不同的革命方式，已經顯示國、共之間難以調和的分歧。

徵引書目

(一) 史料彙編、報紙

1. 李雲漢,〈孫文主義學會與早期反共運動(1925-1926)〉,收入高純淑編輯,《中國國民黨黨史論文選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
2. 孫中山,〈三民主義〉,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3. 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收入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學院編纂,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斯大林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蔣中正,〈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收入蔣總統言論彙編編輯委員會,《蔣總統言論彙編》,第二卷,臺北:正中書局,1956。
5. 戴季陶,〈致蔣中正先生書〉,收入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9。
6. 〈中國共產黨為反抗帝國主義野蠻殘暴的大屠殺告全國民眾〉,《嚮導》117(1925.6):1075-1077。
7.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68次會議紀錄節錄(1925年6月25日,莫斯科)〉、〈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第4號紀錄(1925年7月28日,莫斯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草案(1925年9月28日,莫斯科)〉,收入李玉貞譯,《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25~)》,第一卷,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
8. 戴季陶,〈指導五卅事件國民運動的注意點〉,《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6月27日,第3-4張。
9.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

7月27日，上海，第3-5頁。

10.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8日，上海，第2-3頁。
11.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二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29日，上海，第2-4頁。
12.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三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30日，上海，第2-4頁。
13. 〈戴季陶對於時局之談話〉，《民國日報》（上海），1925年7月31日，第1版第2張。
14. 戴季陶，〈孫文學說之哲學的基礎（四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7月31日，上海，第2-4頁。
15. 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六續）〉，《民國日報·覺悟》（上海），1925年8月3日，上海，第2-4頁。
16.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收入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二）專書

1.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型態（修訂本）》，北京：華文出版社，2010。
2.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李雲漢，1987。
4. 李達嘉，《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
5. 范小芳、包東波、李娟麗，《蔣中正的國策顧問戴季陶》，北京：團結出版

- 社，2011。
6.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1。
 7. 徐素華、賈紅蓮、黃玉順等，《三大思潮鼎立格局的形成—五四後期的思想文化論戰》，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7。
 8. 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的生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9. 賀淵，《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10. 劉懷玉、劉維春、陳培永，《資本主義理解史》，第三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11. 滕峰麗，《民國時期的三民主義—戴季陶思想研究（1909-1928）》，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
 12.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3. 戴季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25。
 14. 薛銜天，《民國時期中蘇關係史（1917-1949）》，上冊，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9。
 15. 謝幼田，《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上冊，香港：集成圖書有限公司，2001。

（三） 期刊、學位論文

1. Dirlik, Arif. "Mass Movements and the Left Kumintang," *Modern China* 1:1(January 1975): 46-74.
2. Lee Chiu-chun, "From Liberal to Nationalist: Tai Chi-t'ao'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Order." Ph. 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3.
3. Mast III, Herman and William G. Saywell.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1 (November 1974): 73-98.

4. Tucker, Rober C. "The Emergence of Stalin's Foreign Policy," *Slavic Review* 36:4(December 1977): 563-589.
5. 岳 艷,〈陳獨秀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思茅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8.2 (2002.6), 96-98
6. 秋 白,〈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嚮導》125(1925.8), 1145-1148。
7. 馬佩英,〈戴季陶的政治思想論〉,《史學月刊》3 (2007), 57-61。
8. 張 玲,〈1926-1935 年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政策和影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法政學院博士論文,2002。
9. 陳紅民輯注,〈戴季陶 1925-1926 年間至胡漢民等幾封信〉,《民國檔案》4 (2005), 3-9。
10. 陳獨秀,〈國民黨新右派之反動傾向〉,《嚮導》139 (1925.12), 1265-1267。
11.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續)〉,《嚮導》130 (1925.9), 1196-1197。
12. 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嚮導》129 (1925.9), 1186-1190。
13. 陳獨秀,〈上海大屠殺與中國民族自由運動〉,《嚮導》117 (1925.6), 1077-1079。
14. 陳獨秀,〈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眾運動中之影響〉,《嚮導》125(1925.8), 1144-1145。
15. 戴季陶,〈因五卅事件告中國國民〉,《湖州月刊》2.4 (1925), 5-8。

The Role of Party in Tai Chi-tao's Thoughts in 1925

Shih, Chun-Chun

Postdoctoral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ai Chi-t'ao's Reflection on the role of party in 1925. Tai emphasized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experience of Russian Revolution and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especially necessity of productive force. He then recognized the policy of alliance with Soviet Union and the role of party which l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Tai also talked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and social groups. Tai pointed out that Kuomintang (KMT) should lead and chang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social elites, and made them become revolutionary leaders. If they couldn't be changed, KMT members should replace these social elites. According to Tai's point of view,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still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ese peasants and workers to make them become radical. In other words, CCP created class struggles by inculcation. Considering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 and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 Tai believed that CCP's strategies of mobilization was against practical reality in China and experience of Soviet Union. However, the leader of CCP, Chen Duxiu, had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bout party. Chen believed that class struggle should be means for mobilizing workers and peasants for national revolution. He also indicated that party reflected interests of social class. He criticized that Tai was

willing to unitized KMT and make KMT as a bourgeoisie party. According to Chen's points of view, KMT and CCP represented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n; Tai thought these parties guided different revolutionary ways. Chen and Tai had different points about the role of party, but they both had similar conclusions that KMT and CCP would have conflicts soon. These conclusions showed a chasm between two parties even though the Comintern insist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Keywords: Tai Chi-t'ao, party,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class struggle, Chen Duxiu